

认识论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哲学解读及其理论意义

张 郭 男

(国防大学 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系,上海 200433)

摘 要: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属于实践理念的范畴,其本质是“自由人联合体”理论在当代世界现实中的具体化、现实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自由人联合体”理论具有价值指向上的一致性、理论逻辑的连续性和哲学方法论上的相似性。当代世界现实环境体现为两种制度的长期并存与社会主义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以及资本主义深层矛盾的逐渐暴露,和社会主义因素的不断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理念是认识运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认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它科学地回答了“世界往何处去”的问题,彰显出中国驾驭资本逻辑的自信,回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面临的时代问题。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实践理念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8)06-0055-08

自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以来,国内外哲学界已经从世界历史、“类哲学”、普遍交往等维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应当看到,从认识论角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哲学解读仍然存在不足。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属于实践理念的范畴,其本质是作为理论理念的“自由人联合体”在当代现实环境中的具体化、现实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与当代现实逻辑相结合产生的实践逻辑。从这样的维度出发,我们就能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本质、基本内涵和时代意义有更深刻的理解。

一、理论渊源: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理论

“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在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共同体、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共同体进行批判性总结的基础上,提出的对未来社会的科学设想。这一“真正的共同体”的实现,有赖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私有制的消灭等诸多条件的满足,需要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这一理念所反映的人的需要或要求还不能在实践中直接地加以现实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解决人类生存、发展问题的方案,是中国共产党勾勒世界格局的“建筑图纸”。二者具有价值指向上的一致性、理论逻辑的连续性和哲学方法论上的相似性。因此,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理论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渊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自由人联合体”理论理念与当代世界发展的现实逻辑相结合的产物。

(一)价值指向上的一致性:对“自由自觉的活动”的追求

收稿日期:2018-09-12

作者简介:张郭男(1992—),男,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系博士。

马克思主义把自由自觉的活动作为人的本质特征,认为共产主义的价值指向就是人的解放,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因此,对自由自觉活动的追求,就构成了人类发展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或者说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不懈动力。与“自由自觉的活动”相对立的,就是异化劳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进行了严密细致的分析批判,提出了著名的“四个异化”的观点。在成熟时期的著作中,也频繁使用这一概念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抗进行描述。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的克服,必须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灭亡为条件。无论基于真理还是道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都是必然灭亡的。资本主义蕴含的内在矛盾,只有通过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旧的阶级对立的条件、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才能得到最终解决。马克思的伦理观之所以超越了庸俗的以抽象公平、正义、自由等为理想的伦理观,正是因为马克思将实现“自由人联合体”、打碎私有制为劳动带来的种种枷锁,实现“自由自觉的活动”作为价值指向的目标。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价值指向上,与“自由人联合体”是完全一致的。当今国际社会中的穷国与富国的关系,也表现出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雇佣劳动与资本对立的某些特征,这是资本逻辑主体地位进一步加强,以及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必然产物。国际范围内的分工正在逐渐呈现固定化的趋势,资本、人才、先进科技集聚的少数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占据了优势地位,随着时间的增长,其地位越来越不可撼动。而主要靠出口原料、能源、简单劳动带来的低附加值产品的穷国却越来越难以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发展的机会,在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以及富国的经济侵略下更加落后。人类虽然共享一个地球,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当今世界还是一个“货币-资本”抽象统治的虚幻的共同体。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目的就是対资本逻辑的统治地位进行修正,提升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地位,消除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带来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全球性问题,努力提高弱国穷国在全球化中的地位。这一理念与“自由人联合体”追求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在价值指向上是完全一致的。

(二) 理论逻辑的连续性:不断推进“真正的共同体”具体化

马克思对共同体的研究采用了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历史主义的方法。在他看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的扩大,共同体在历史中不断演进,可以概括为多种典型的模式。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括亚细亚的、古典古代的、日耳曼的共同体三类。这三种模式都是自然形成,都以占有大地为前提,并受到自然条件、部落自然素质、与敌对部落和四邻部落交涉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最终这些共同体就会逐渐自然消解。资本逻辑带来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打破了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国家。这是人类向自由王国迈出的一大步。但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处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类注定无法完全掌控自己所展现出的巨大生产力,个性自由也因被物束缚无法得到保障。由于劳动异化的存在,这一阶段存在着关系对个人的独立化、偶然性对个性的压制、阶级关系对私人关系的压制。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只不过是“虚幻的共同体”。马克思在其著作中辛辣揭示道:“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从“虚假的共同体”到“自由人联合体”的重要一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理念在现时空的具体化、现实化过程。资本逻辑扩张下全球化进程的骤然加速,导致了不同民族、国家命运的相互联结,但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共同体”。原因就在于资本扩张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并不是通过和平、公正的方式取得的,而是经由血与火获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红利并没有合理地在各民族之间进行分配。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下,各民族国家有着“相同利益”而绝非“共同利益”。不平衡的发展使得国家贫富差距、实力差距拉大,催生了殖民主义、侵略战争等灾难。全球社会中的各民族、国家虽命运相连,构成的却只不过是“虚假共同体”。以上世纪日本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为例,其宣扬的东亚、东南亚诸国“共存共荣”,建立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只不过是虚假的旗号,实质则是借以满足自身的扩张野心,攫取东亚、东南亚地区的丰富资源和广阔市场,支持其争夺霸权的战争。20世纪初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与20世纪下半叶西方左派学者的“新帝国主义论”话语,深刻揭示了资本逻辑的深度扩张带来的资本操纵一切、不断强化帝国体系的历史景象。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资本逻辑主导一切的纠正,是“自由人联合体”理论在民族国家林立的时代所必然采取的实践路径。国际社会只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感召下,主动作为,摒弃以单一国家利益为旨归的行为模式,积极推进建构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才能遏制“坏的全球化”带来的贸易战争、生态危机、地缘战争等一系列恶果,真正带来“好的全球化”,为全世界的人类带来普遍的福祉。

(三) 哲学方法论的相似性:“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马克思反对把头脑中设定的“乌托邦”作为社会理想,他主张“通过批判旧世界来发现新世界”,即以批判为工具,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在此基础上把握未来世界的基本原则。作为这种科学方法论事实的“自由人联合体”,从表面上看虽然与启蒙学者、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会理想具有相似的外观,但从科学性上看已经有了天壤之别。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科学论断,是建立在对人与社会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反对唯心论哲学家对人的理性意义的过分强调,反对把人规定为理性的存在物,和把社会理想寄托在少数杰出人物的灵感闪现上,另一方面又反对旧唯物主义哲学家把人理解为万古不变的“感性的存在物”,把人性归结为单纯的自然性。这两种人性论都会导致脱离现实世界去臆想理想世界,从而离真理越来越远。

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探索,同样建立在对人与社会的科学认识基础上,并采用了同样的“批判—发现”的哲学方法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倡导的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生态观等,都是建立在对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深刻体察和批判的基础之上。是在力量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大背景下,针对生态危机、环境破坏、恐怖主义、霸权政治等世界现实问题提出来的切实的解决之道。同“自由人联合体”一样,“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是凭空建成的,而是在“旧世界”的基础上、通过改变现状一步步建成的。这在哲学方法论上是高度一致的。

二、现实逻辑:“一球两制”及资本主义深层矛盾的暴露

人类必将走向“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属于理性认识的范畴。理性认识反映的是客观实际中一般的规律性的东西,而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则是具体生动的。不去了解复杂生动的、作为实践活动对象的客观实际,而只是死死抱住马列主义的“本本”,就难免会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潭。因此,仅仅认识到人类必将走向“自由人联合体”这一“上篇”还远远不够,更要掌握现实逻辑这一“下篇”,这样才能从二者的结合中认清现实的实践逻辑。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要求,对社会现实的探索,既不能将其看成抽象的“平削的现实”,也不能用对特殊的具体描述来代替具体的现实历程。“如果现实是一个辩证的、结构化的整体,那么对现实的具体认识就不等于把事实与事实、发现与发现系统地排列起来,宁可说,它是一个从整体到部分以及从部分到整体、从现象到本质以及从本质到现象、从总体到矛盾以及从矛盾到总体的具体化过程。”^{[1]30}以这一方法论为指导,从全球范围来看,当代世界发展的现实,就体现为“一球两制”即两种制度的长期并存、社会主义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以及当代资本主义深层矛盾的逐渐暴露,以及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发展。前者表明了资本逻辑与资本主义存续的当代合法性,后者则表明了人类超越资本逻辑的必然性与可行性。

(一) 两种制度的长期并存与社会主义的力量还不够强大

资本逻辑宰制带来的灾难,使得“如何超越资本逻辑”、构建“真正的共同体”成为国际共运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这一理论与实践之路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大致呈现出了从强调暴力革命、世界革

命、不断革命,到提出和平斗争、和平相处的转变。当前,世界大势仍然处在两种制度长期共存、社会主义的力量还不够强大的历史阶段。

19世纪40年代,马、恩开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工作。在《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等著作中,他们提出并论述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共同胜利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在马恩的理论视域中,由于“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为,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2]86-87},因此,他们并没有系统思考过两种制度长期并存的情况。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指明了前进道路。列宁根据俄国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实情况,提出了“一国胜利论”“利用资本为社会主义服务”“和平共处”等新理论。基于新的世界格局和历史条件,列宁认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可能一举代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或几国胜利与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之间,间隔着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因此,社会主义要向资本主义学习并吸收其一切文明成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如何对待资本与资本主义问题上,也走过了一段艰苦探索的历程。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提出了“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资本主义”^{[3]286},也即在消灭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情况下,有节制地利用资本来恢复国民经济。《论十大关系》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思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与黄炎培、陈叔通等人谈话,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即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客观上决定了做不到完全消灭非公经济的情况下,适当发展非公经济,与公有制企业展开竞争。但是,这一宝贵思想在之后的实践中却没有坚持下来。消灭资本、消灭资本主义的思想仍在不断延续。毛泽东之后,邓小平重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根据中国现实状况,把利用资本提到了“发展战略需要”的高度。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不再视资本为洪水猛兽,而是大胆引进资本、融入全球资本市场,利用资本、驾驭资本来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对世界的大门再次打开。

从消灭资本、“一下子”的革命实现共产主义,到“一球两制”“两种制度长期共存”,再到“充分利用资本”、驾驭资本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正是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共产主义实践的产物。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社会主义利用资本为自身服务的趋势渐趋加强,并从强调暴力革命逐渐转变为“和平共处”,吸收资本主义优秀成果。众所周知,在当前“一球两制”的格局中,社会主义仍然处于力量还不够强大,而资本主义在经济水平、科技实力、人才状况等方面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最终消灭资本与资本主义,带领人类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就必须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不断壮大自身实力,增强自身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发言权。解决世界问题须先解决本民族的问题,这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是不相违背的。

(二) 资本主义深层矛盾的暴露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必然会导致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只有走向“自由人联合体”,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才能得到解决。这一科学论断对于当今“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仍不过时。资本主义为自身的扩张创造了一套成熟的经济运行体系,却把公平、正义等道德原则置于脑后。能够制约不公正国际经济体系的全球政治体系、道德秩序的缺失,使当代国际社会中存在着复杂深刻的矛盾。

首先,资本逻辑主体地位进一步加强,形式更加多样。20世纪后半叶,乘着新科学技术革命东风,资本主义生产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资本流动性、灵活性大大增强。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资本迅速崛起,“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逐渐形成,贪婪性与寄生性不断凸显。其次,不平衡的经济全球化强化了不平衡、不公正的国际政治、安全体系,加剧了世界的不稳定性。经济体系方面,著名的依附理论(the Dependency Theory)指出,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本质上处于依附、被剥削与剥削的关系。国际政治体系方面,西方某些大国仍然秉持着冷战的零和思维,对新兴大国的崛起持恐惧态度,千方百计进行围堵与遏制。第三,“文化冲突”与“文化霸权”现象愈演愈烈。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冲突从政治、军事领域逐渐转移到意识形态、文化领域。在此背景下横空出世的“文明冲突论”与“历史终结论”

等理论热点,无不或明或暗地体现了西方强势文化的傲慢与偏见。在众多学者看来,“欧风美雨”为绝对主导的“全球化文化”的强势入侵实质上就是文化帝国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表现。第四,生态危机等新的全球性问题日渐突出。由于资本逻辑的唯一追求就是价值增殖,因此,无限制的资本逻辑必然走向对自然的无节制索取,对生态的无节制破坏。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曾经在本国造成的严重污染与资源过度消耗,在全球化时代被转嫁到了发展中国家。从根子上治理全球生态危机,亟需建立全球化的生态治理体系,这已经成为摆在整个人类面前的紧迫课题。

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在不断暴露其深层次矛盾的同时,也在进行着自我扬弃,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的力量正在加速增长着。一方面,以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力量在不断地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当今的中国在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国防力量、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与号召力都有显著提高。另一方面,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4]628}随着现代生产力与社会化大生产的迅猛发展、“多领化”工人阶级的抗争,以及股权分散化等生产关系方面的一系列变化,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也即经典作家所说的“新社会因素”)也在不断增长。

三、实践理念:理论逻辑与时代现实“相结合”

“自由人联合体”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实践目标,“历史的全部运动”,都是这一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5]81}。但是,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样,“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地域,这一社会理想的实现都会展现出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特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是科学社会主义普遍规律与中国实际的“相结合”,与之类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当今时代世界现实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引领人类命运进入新时代的“实践逻辑”,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具体化、现实化的成果。这一理念的诞生来自于现实,也就是“通过批判旧世界来发现新世界”;又反过来去规范现实,也就是对资本逻辑的过度扩张进行引导与纠偏。在这样的实践与认识的辩证运动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得以不断丰富、对实践的影响也将更加深化。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理念体现了认识运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理念体现了认识运动的合规律性。实践理念作为理性认识过渡到实践的“桥梁”,是人类在改变外部现实之前所绘制的“客观世界图景”,这一“客观世界图景”只有被对象化、现实化,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理性认识向实践的飞跃,这就是实践理念的现实化过程。“自由人联合体”是马恩从唯物史观的高度设想的未来社会的理想形式,这一理想的实现是以生产力高度发展、分工的消灭、城乡分离的消灭和个人的全面发展为前提的。显然,这些前提条件在我们的现时代还不完全具备。唯物史观揭示的客观规律表明,当人们的思想超越了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把将来才能付诸实践的事情勉强拿到现在来做,就会造成理论脱离实际的“左”的错误。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直截了当地把“自由人的联合体”拿来,作为当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理念,体现了对铁的历史规律的基本尊重。

“实践理念能否现实化,首先取决于它所包含的关于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是否正确,是否具有真理性。只有正确反映了客观世界的物的尺度的实践理念,才能通过实践活动转化成现实。”^{[6]570}“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一方面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共同体理论中汲取了丰富的理论营养,符合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顺应了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又符合当前世界的客观实际,能

够认识到民族主义的旺盛生命力、“一球两制”的长期存在等客观现实,在不违背世界各国利益的前提下,求得合作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因此能够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并付诸行动,并取得理想的效果。“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理念的提出十分及时又不超前,处处体现了对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尊重,自觉地将自身放置在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共同体到“自由人联合体”的历史发展谱系中,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体现。

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理念体现了认识运动的合目的性。一种理念能否得到有效实现,除了要反映外在的世界的物的尺度之外,还必须反映出人的实践活动的需要,也即人的内在尺度。只有适应现实世界需求的理论构想,才能真正扎根于社会现实,得到世界各国的真诚拥护。一种理论构想在世界产生作用和影响的深度,主要取决于该理论的构建能否满足世界各国发展的现实需要。只有当一种理论能够解决全球现实问题时,它才能成为各国服膺的指导理论及行动指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理念,既体现了当前世界各国、地区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需要,也体现了各国、地区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实现共同繁荣,增进人类共同利益的需要。

一方面,资本逻辑统治地位下带来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已经是全人类不容回避的问题。其中,不少问题已经对人类命运构成重大威胁,例如核安全问题、全球性重大疫情、气候变化造成的冰川融化等等。“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7]资本逻辑本身无法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以生态赤字为例,“杰文斯悖论”已经表明,在资本宰制下的世界,被学者、官员、公众所寄予厚望的“技术解决方案”是治标不治本的。它们只能缓解而不能彻底消除已经蔓延到全球范围的生态危机。至于发达国家生态环境方面的进步,则是高污染、高消耗低端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结果,因此也是一种“伪解决”方案。彻底解决生态问题,达成发展与自然之间的和解,必须从根本入手,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限制。必须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前进,勒住资本逻辑这匹烈马的笼头,改变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

另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还在于满足了人类利用资本逻辑,共同繁荣进步的需要。人类共同利益的诉求,不仅包括解决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短缺、恐怖主义、难民潮、核威胁等问题,还包括通过释放经济全球化正面效应是否能带来产品、资金等生活与生产资料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再次打开国门,利用资本力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中国共产党人在一国范围内成功地驾驭了资本,使得中国迅速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给社会主义注入了新活力。然而,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形势发生变化。原先高擎经济全球化大旗的西方国家面对危机产生了怀疑动摇。不少国家将挫折归罪于全球化,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为标志,“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习主席指出,问题不是经济全球化,而是对资本逻辑负面效应的放纵导致当前的经济全球化遇到挫折。要实现“经济全球化再平衡”,应限制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发挥其正面效应。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理念体现了认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理念,是把具有高度抽象概括性的实践目标,与当前世界的实际结合起来,将理性认识进一步具体化,形成了马克思所说的——“观念地存在着”——的实践结果。这一结合是具体的,是对当前世界客观现实及其发展趋势的正确反映,而不是抽象的和脱离历史的;这一结合也是动态的和开放的,是一个不断扩充、调整、创新发展着的过程,体现着历史、现在和未来的统一。从这样的要求出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下几个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性设想:构建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构建互利共赢的开放格局、构建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建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过程中,中国还逐渐探索出了多层次、多维度的实践方法。例如,根据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不同的实际情况加深互利、互惠、互信,构建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等多个层次;通过建立地域性的、示范性的“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等)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先推动建立不同领域的、意义关键的“命运共同体”,如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等。从实践途径来看,中国采用的

途径包括:外交上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和新型大国关系等一系列和平外交的理念;经济上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致力于“经济全球化再平衡”;政治上努力化解国际社会矛盾死结,例如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文化上出台一系列政策增进国家间文化交流;生态环境上,积极参与到国际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的各项协议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等等。沿着这些途径,中国提出了众多富有成效和中国特色的具体举措,如“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全球政党大会”、国际维和、国际海域护航等,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道路上发挥了领导作用。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理念的时代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性和重要时代意义,既是“中国方案”,更是“中国智慧”;既与中国古代的理想社会遥相呼应,又处处契合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基本精神,学术意蕴极为深厚。

(一)科学回答“世界往何处去”的问题,体现对社会历史规律的自觉遵循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在世界面临和平赤字、安全赤字、文化赤字、生态赤字等多重危机、逆全球化抬头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体现了中国对驾驭资本逻辑、发挥其正面效应的自信,符合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人类必将走向“自由人联合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这一理论逻辑的当代实践方式,是当代符合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人类社会理想。“自由就是根据真理性的认识来改造世界,也就是对现实的可能性的预见同人的要求结合起来构成的科学理想得到了实现。”^{[8]20}“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新激活了共同体的思想资源,与国际社会中自由主义、保护主义形成鲜明对比,使人类走向真正的自由,即内蕴于共同体中的自由,大同团结与个体自由相统一基础上的更高层次的自由^[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社会历史规律的自觉遵循。对比中西文化,西方文化往往重“自愿”原则而轻“自觉”原则,缺乏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和自觉遵守,例如美国放任温室效应、冰川融化等全球性气候危机的日趋严重,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就是为了一国私利,明知规律而不遵守的表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责任意识,也有利于中国自身的未来发展。中国在快速发展、由大变强的同时,面临着诸多的“灰犀牛”事件。很多“灰犀牛”事件都必须依赖国际社会的力量,精诚合作,以负责任的态度去解决。例如美国债务违约问题、生态环境治理问题等。“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为中国解决这些全球性的复杂问题提供有效途径和国际平台。

(二)彰显中国驾驭资本逻辑的自信,回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面临的时代问题

中国是当前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方面有着丰富历史经验与教训。中国发展到今天,经历对资本逻辑的彻底拒斥,最终通过改革开放,走上了利用资本发展自身、壮大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驾驭资本逻辑的自信,是对“逆全球化”思潮的有力回应。资本流动可以带来互利共赢,发挥资本逻辑的正面效应,遏制其负面影响,符合国际社会的需要,也是人类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必由之路^[10]。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回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面临的时代问题。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在西方学术界一直有较大市场。甚至部分左翼学者也认为,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理想已经难以实现。以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旗手”科恩为例,他提出,由于工人阶级的四个典型特征(构成社会大多数、生产社会财富、是受剥削者、是穷人)已经离散,在资本逻辑之下无产阶级的世界联合已经难以想象,再加上人口膨胀、地球资源承载能力有限,马克思所设想的物质资源极大丰富有可能永远无法实现,因此人类能否实现共产主义是大可质疑的^{[11]175}。面对这些质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限制纯粹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发挥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效应,建构起新型的全球安全体系、政治秩序和生态体系,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提供了可行性极强的、适应当代人类社会需要的实践路径,对于悲

观主义的观点是有力的回击。

(三) 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提升了文化自信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独特的“天下”观,西方众多学者认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白鲁恂甚至直接把中国称为“一个文明伪装成的国家”。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型国家”的历史,以及长期以来远高于民族认同的文化认同,使中国“天下观”具有鲜明的各美其美、海纳百川的风度。《礼记》中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思想,道家也有“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的思想。无论是儒家的“中庸”还是道家的“玄同”,都体现了中国人对不同文明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习主席在国际社会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国际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提升了文化自信。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2]。我们只有认清它的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才能在这一伟大理念的推进、落实过程中,始终保持理论清醒与理论自觉,讲好中国故事,使更多国际行为主体参与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来。

[参 考 文 献]

- [1] 科西克. 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M]. 刘玉贤,译.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毛泽东文集(第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6] 肖前.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下册)[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 [7] 习近平.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N]. 人民日报,2015-09-29.
- [8] 冯契. 冯契文集(第三卷)[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 [9] 李庆. 初心、自信、理性——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精神的新思考[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8,(8).
- [10] 陈建先. 习近平系列讲话所蕴涵的十大博奕思维[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8,(7).
- [11] 科恩. 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 [12] 李钰. 改革促进社会发展的历史、路径及因素[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8,(7).

The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Epistemology

Zhang Guonan

(Department of Marxist Philosophy,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practical concept, and its essence is concretion of "free man Consortium" theoretical concept. These two theories share the common value orientation, continuity of theoretical logic and similarity of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y. The practical environment of the theory is embodied in the long-term coexistence of two systems and the gradual exposure of deep contradiction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The concept embodies the unity of the regularity of cognition and the unity of purpose, and embodies the concrete historical unity of cognition and practice.

Keywords: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ommunity of freeman; practical idea

[责任编辑:朱丕智]